



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

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

Ideal, Dignity, an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Southern Literati and the Society in Yuan
Dynasty China

申万里 著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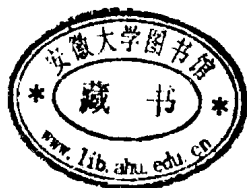


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

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

Ideal, Dignity, an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The Southern Literati and the Society in
Yuan Dynasty China

申万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申万里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2.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09062-8

I. 理… II. 申…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元代②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D691.71②K24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413 号

-
- 书 名 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
著 者 申万里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2 插页 2 字数 5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062-8
定 价 88.00 元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扶持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2
二、本书的主要观点	4
三、前人研究成果综述与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9
四、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15
第一章：怀旧情结	
——元代江南士人精神世界初探	16
一、痛苦与快乐：元代江南士人的南宋记忆	18
二、同情与愤怒：元代江南士人对先贤后裔的关注和 对现实社会的批评	28
三、特立独行：元代江南士人对梦想的坚持与对现实的逃避	38
四、结语：元代江南社会的怀旧之风	43
第二章：元上都的江南士人	
——兼论元代江南士人与元上都及相关知识在江南的传播	45
一、元代江南士人与元上都	47
二、元代江南士人到达上都的旅程	53
三、元代江南士人的上都生活	59
四、元代江南士人与上都及其相关知识在江南的传播	71
五、结语	75
第三章：游京师	
——元大都的江南儒士群体	77
一、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基本情况	78
二、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目的是	85
三、元代江南士人在大都求官的方式	90

四、元代江南士人在大都的生活	98
五、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结果	108
六、结语:元代江南士人游京师的价值与文化意义	114

第四章:生存奋斗、社会经营与权威重塑

——元代江南地方社会隐士研究	118
一、元代江南隐士的构成	120
二、元代江南隐士的谋生手段	139
三、元代江南隐士的社会经营	149
四、元代江南隐士的生活	169
五、元代江南隐士的权威重塑	180
六、结论	185

第五章: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

——以郭昇为中心的考察	187
一、郭昇日常生活轨迹的复原(至大元年〔1308〕八月二十七日到 至大二年〔1309〕十月三十日)	188
二、从郭昇《云山日记》看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	210
三、士人与社会信息	224
四、士人与地方官学	232
五、士人与地方社会	237
六、士人日常的娱乐与文化活动	240
七、结论	241

第六章: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

——以郭昇、戴表元为中心的考察	244
一、元代江南士人郭昇的社会网络	245
二、元代儒士戴表元的社会网络	263

第七章:元代江南特殊士人群体

——江南孔子后裔初探	288
一、元代江南孔子后裔发展概况	290

二、仕宦	298
三、社会生活	304
四、余论	312
第八章：元代的浦江郑氏	
——中国古代同居共财家族的一个个案考察	314
一、家世	316
二、家族管理	326
三、仕宦	332
四、社会网络	336
五、余论	350
第九章：从武到文	
——元代张瑄及其家族初探	353
一、元初张瑄的崛起	354
二、张瑄及其家族的发迹	357
三、朱清、张瑄之狱	360
四、张瑄家族的转型与复兴	363
五、结论	366
第十章：元代江南的民间义庄	
——兼论元代江南士人在地方社会保障中的作用与影响	368
一、元代江南的民间义庄	368
二、元代江南民间义庄的运行状况	372
三、元代江南民间义庄的管理制度	378
四、结论	384
征引文献与参考书目	385
附录：郭昇社会网络统计表	397
人名索引	485
后 记	502

绪论^①

至元十八年(1281)六月初六日,元朝大都(今北京市)的宫廷里,发生了一件奇事,一位江南儒士私自闯入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宫殿里,这位勇敢的儒士为什么要私闯宫殿,元朝官方档案记述:

中书省奏:“年时冬里,一个蛮子人,跟着抬酒筭的人,入大殿里叫,上叫省官人每问者。么道,圣旨有来,如今俺问得:‘本人原是江南好投拜人户,^②被乾讨虏军人^③掳到陕州,买与人家做奴婢来。他自用钱赎身,做了陕县百姓也。来到南阳府,与一个蛮子秀才一处,写陈言文字:‘江南被掳人口,放令为良。’待这般的告来,因跟着抬酒筭的人,入大殿奏来,这般的不是也。’与了招伏文字,商量来,打一百七下,发得陕州,做民户去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打了发将去者。”^④

① 关于士人的概念,学术界有比较全面的论述,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收入《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第253—291页)的《引言》部分,王明荪《元代的士人与政治》(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28—31页。本文所论述的“士人”,即英文literati,指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王明荪在《元代的士人与政治》第23页认为:“古代的知识阶层即为士人。”本文赞同这一观点),或日本学者所说的“知识人”或“知识分子”(见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五》,第636—679页,中华书局1993年9月)。

② 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浙江潮》(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97年11月);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伯颜率元朝大军来到杭州城下,宋朝奉表及国玺以降,“遣千户囊加歹等人城慰谕,令居民门首各贴‘好投拜’三字”以示归顺,所以,“好投拜”人户,即归顺的江南人。

③ 关于乾讨虏军,《元史》卷九十八《兵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519页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八月,江东道金事马奉训言:“刘万奴乾讨虏军,私相纠合,结为徒党,张弓挟矢,或诈称使臣,莫若散之各翼万户、千户、百户、牌甲内管领为便。”省院官以闻,有旨,可令问此军:“欲从脱欢出征掳掠耶?欲且放散还家耶?”回奏:“众军皆言,自围襄樊渡江以来,与国效力,愿令还家少息。”遂从之。……十月,从月的迷失言:“以乾讨虏军七百人,籍名数,立牌甲,命将官之无军者领之。”从上可以看出,乾讨虏军是在元朝进攻南宋时,北方一些流民组成的队伍,并不属于元朝军队的系列,专事抢劫掳掠,给江南造成很坏的影响。

④ 《至正条格·断例》卷一《卫禁·闯入宫殿》,第166—167页,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校本。

材料中的这位江南士人,原是江南居民,元朝统一战争期间,被乾讨虏军人掳掠到陕州(今河南陕县一带),卖为奴婢,他用钱赎身以后,感到元朝统一战争期间掳掠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从陕县来到南阳,与另一个同是江南士人(秀才)的同志者,写了向元世祖上奏的文书(陈言文字),计划赴阙上奏。令人惊奇的是,他随着宫廷抬酒筲的人,混入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宫廷,毅然上书,要求“江南被掳人口,放令为良”。士人这种私闯皇宫的上书方式,在中国古代非常少见,反映了在元朝蒙古统治的特殊情况下,江南士人为了其政治理想和切身利益,置生死于不顾的豪迈情怀。从材料来看,忽必烈对这位勇敢的江南士人还算比较宽厚,杖一百零七,押回陕州做百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士人冒险上书的现象?元朝统一以后,生活在蒙古统治下的江南士人的处境如何?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特点?他们又是怎样为理想、尊严和生存条件而奋斗、挣扎?本书的研究,将试图回答以上的问题。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通过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生存挣扎、文化信息扩散、日常生活、社会网络以及江南士人游大都、上都,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的互动,江南士人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中国文化与传统承载者之一的江南士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他们为改善生存权利的抗争以及他们在江南社会发展中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影响。

唐宋以来,士人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主要角色,国家各级文官一般都具有士人的身份认同,地方精英也同样以士人的身份自居。两宋期间,“文人作为一种固有利益的地位集团”出现了,“南宋时,即使部分通过考试过程者(科举),可在地方社会取得地位”。这些文人除了涉足科举和国家事务以外,也“积极参与地方事务”^①。这样,士人既是国家各级政权的控制者,也成为地方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南宋灭亡以后,在蒙古统治下,江南士人精英基本上失去了做官的机会,社会地位下降,处境恶化。大量的士人精英沉浮民间,沦入社会下

^① 贾志扬《宋代科举》中文本序,第3页,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层,相当一部分人则需要离开家乡,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元朝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明显下降。从史料看,元代江南士人在不利的环境中表现出顽强的适应能力,他们通过游京师等手段争取入仕的机会;通过构建社会网络,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有元一代,江南士人对江南社会的政治生活依然具有明显的影响。元代江南士人还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活动,推进社会教化的推广和实施,士人还利用他们游上都的机会,担当了社会信息的重要传播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江南社会对元朝政治和社会信息的需求。可以说,元代江南士人群体通过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基本保持了他们在江南社会中的精英地位,并且成为了江南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江南士人在江南地方社会的经营,提高了其在江南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控制能力,成为明清地方乡绅阶层的前身。

本书主要内容:第一,通过元代江南士人普遍存在的怀旧情结,探讨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第二,考察元朝江南士人游上都的情况以及江南士人将元上都及相关知识在江南传播的过程与途径。第三,考察元大都的江南儒士群体。通过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和求官情况,探讨元朝江南士人对元朝政治的影响以及顽强的适应能力。第四,考察元代江南地方社会隐士的归隐情况、谋生手段、社会活动、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生活,探讨地方隐士在经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向明清乡绅群体转变的过程。第五,以江南士人郭畀为例,考察元代江南儒士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士人与社会信息传播、士人与地方学校、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的关系。第六,以郭畀和戴表元为例,考察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揭示元代江南士人社会网络的特点、结构以及社会网络与人生沉浮的关系。第七,考察元代特殊士人群体——江南孔子后裔的发展、仕宦和社会生活情况,考察这一特殊儒士群体在元朝的处境及政治地位。第八,考察元代的义门——浦江郑氏,包括家族发展过程、治家理念、仕宦情况以及社会网络,探讨元代江南地方大族的发展与兴盛的情况,以及江南地方士人在其家族发展和家族社会网络构建过程中的作用。第九,考察元代突起之家——张瑄及其家族,包括张瑄的发迹过程以及“朱清、张瑄之狱”以后,张氏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过程,探讨江南士人对其家族发展的影响以及元代江南大族通过崇尚儒雅,保持社会地位与影响,最终转变为士人家庭的现象。第十,考察元代江南的民间义庄,通过民间义庄的发展与管理制,考察元代江南地方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探讨江南儒士在地方社会保障事业中的地位与

影响。

二、本书的主要观点

本书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冲击，经济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导致的人仕无门，引起了他们对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在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军队打到崖山，南宋抵抗势力彻底被消灭以后，大部分江南士人恢复宋朝的愿望彻底破灭，于是，怀旧成为当时整个元代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入元以后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元朝儒学、儒士未来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特征表现出来。一些人隐居乡间，排斥投降元朝和仕元的士人，对于忠于南宋的士人，他们则表现出特别的信任与关怀，一些人还通过怪异的行为，表示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对于有关教化的社会活动，他们则是积极响应。这种怀旧情绪，在入元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江南士人的言论里表现出来，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方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的队伍中。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客观上反映了进入元朝以后，江南士人的处境或生存状况的恶化。江南士人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或舆论压力，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第二，上都是元朝最重要的草原都城，对于生活在江南的士人来说，新鲜而陌生。元朝统一以后，一些江南士人开始有机会来到这里。元朝中后期，更多江南士人通过扈从、应召、游历等方式来到上都，在元朝皇帝的宴会、狩猎、放走、游皇城等活动中，出现了江南士人的身影。江南士人歌咏上都的诗文，成为元代文学发展的瑰宝。元代江南士人在上都的生活非常清闲，这为他们游览上都景色、参加皇帝的宴会和士人之间的诗文唱酬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士人的诗文中，对上都雄伟的宫殿，元朝皇帝在上都的活动，上都的自然景色、风土民情以及江南士人在上都的感受等内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成为元朝上都及其相关知识在江南传播的重要来

源。通过江南士人游上都,大量的关于上都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江南士人传播开来,成为江南居民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些知识,满足了江南社会认识元朝政权的内在需求,也为江南社会的知识体系中加进一些全新的内容,有利于江南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涵化,为元代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第三,元朝大量江南士人来到大都,尽管他们来到大都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大部分人还是想求官,改变自身的处境。为了达到目的,江南士人在大都各显神通,上书、议政、以文求仕、以才求仕、以技能求仕等成为他们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非常艰苦,寻找合适的住处和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是对他们生存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史料来看,尽管江南儒士在大都的生活条件恶劣,求官也是困难重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都生存下来,一旦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就会迅速在京城建立社会网络,为求仕创造条件。相当一部分士人得到任命,离开京城,也有一些人得到在京城发展的机会,留在大都。江南士人在大都的活动,使他们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不仅在蒙古、色目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现象,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表明了中国士人精英顽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第四,元朝统一江南以后,大量的江南儒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江南地方社会中的隐士。这些隐士中,一部分人尚能依靠前代遗留的财产过上安定的生活,大部分人则需要自谋生计、养家糊口。教书、务农、经商、行医、占卜成为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一些人则通过务农、经商、行医等手段致富。元代江南隐士与地方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诗会、文会、燕集等形式,推动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通过向元朝政府上书、建言等形式,参与地方政治;他们还通过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推进地方教化,扩大儒学影响,维护儒士利益。在元朝,隐士受到地方官府和社会舆论的认同,有一定的话语权,是元朝江南地方社会精英和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元代江南隐士对地方社会的经营,加强了他们对江南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也为他们的社会角色向明清时期地方乡绅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日常生活是元代江南士人研究中的最基本的问题,但由于史料

的缺乏,我们很难对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考察,郭界的《云山日记》,为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通过郭界的记述我们发现,其一,在元代江南士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北方元素。北方的一些日常食物和日常生活习惯开始江南流行,北方人的一些语言和表达方式也逐步被南人接受。其二,离家出游是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离开家乡,到地方政治中心甚至是元朝都城大都寻找发展的机会,是很多江南士人的选择,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化,江南士人开始重视物质利益,在士人之间相互赠送的礼物中出现了“干鱼十斤”和“米一升”等不符合士人文雅特点的内容。其三,在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被情绪低落伴随,这是他们处境与社会地位造成的。与情绪低落相伴的是好酒之习。酒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其四,对社会信息的重视是元代江南士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提高生存能力,他们更加重视对社会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士人传播社会信息的途径很多,主要是书信和社会网络。其五,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占更重要的地位。除了学校固定的春秋祭丁和朔望祭祀以外,士人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要通过学校办理,学校还是士人假日聚会和日常娱乐的地点,学校的内部管理和经济状况也与士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第六,社会网络的发展变化,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影响以及人生沉浮的特点,对我们认识士人与社会的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郭界的社会网络的内容和活跃程度,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但二者具有不同步性,在郭界的家乡镇江和他熟悉的一些地方,社会网络的内容比较丰富,但表现出一些惰性;在郭界不熟悉的一些地方,其社会网络内容比较单薄,但表现比较活跃。从郭界社会网络的结构来看,其一,郭界社会网络主要分布在镇江,不过,从郭界社会网络由核心向其社会网络边缘的延伸情况来看,社会网络的地域分布则表现得更加分散,反映了郭界社会网络以镇江为中心,向外扩展的趋势。其二,就职业来看,郭界社会网络呈现出两点有意思的变化,第一,随着社会网络核心向边缘转化,士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反映出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士人为主的比较封闭的特点。第二,随着社会网络由核心向边缘的转化,社会网络的职业分布越来越复杂,除了与儒士有共同志趣的一些僧人、道士等方外人士,出现了军官、地方豪强、相士、医生、商人等,反映了郭界社会网络外围职业分布比较复杂的特征。其三,从外围向内部的演变来看,郭界社会网络中学官、学职、地方官

吏的比重有增加的趋势,郭界社会网络核心的士人也是一些在地方有影响的士人,以及出身宦宦之家的士人,这些人有能力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给郭界帮助,反映了郭界经营社会网络的利益取向。

戴表元的社会网络与他一生的人生沉浮密切相关,在他事业有所发展的时候,他的社会网络内容就比较丰富,当他人生失意或告老还乡的时候,其社会网络则急剧萎缩。戴表元社会网络的内容也有一些特点,儒士所占比例最高,说明元代江南儒士社会网络中以儒士为主,相对封闭的特点。戴表元的社会网络结构中,还有学官与地方官吏,这一部分所占比重变化较大。在戴表元为一般儒士时,所占比例较小,戴表元出仕学官以后,这一部分所占比例则是明显提高,反映了元代江南士人社会角色的变化对社会网络的影响。

第七,北宋末年,孔子四十八世孙、袭封衍圣公孔端友南渡,形成孔氏南宗。元代孔子后裔在江南分布日益广泛,除了衢州的孔氏南宗以外,还有平阳孔氏、临江(清江)孔氏、黟县孔氏、溧阳孔氏等。元朝对孔子后裔实行优待政策,江南孔子后裔充分利用有关政策,积极争取入仕的机会,衢州孔氏、平阳孔氏、建康孔氏的仕宦都取得了成功。江南孔子后裔还通过社会交往、婚姻等形式扩展社会网络,扩大影响。元代江南孔子后裔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比较优裕。元代江南孔子后裔是江南社会中一个比较活跃的儒士群体,其社会活动对扩大江南儒士的影响、传承和发展儒学具有积极意义。

第八,浦江郑氏同居共财,历经宋、元、明三朝,延续三百多年的时间,在江南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古代世家大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浦江郑氏在宋代只是一般的地方大族,影响不出乡里。元代由于受到两次旌表,影响迅速扩大,元末发展到极盛。明初由于对东南大族采取打击限制政策,郑氏家族的发展受到影响,明中期迅速衰落。元代浦江郑氏的家族管理形成制度,主要有:治家原则(孝、义、俭)、尊祖和敬家长制度、子弟教育制度、宗族保障制度和禁止妇女干政制度(“勿听妇言”)等。浦江郑氏的仕宦,从郑文融(大和)开始逐步取得成功,到元末丞相脱脱掌权时期,浦江郑氏子弟有数人到元朝中央做官,并与丞相脱脱、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浦江郑氏发展到鼎盛。浦江郑氏非常重视社会网络的建设,其社会网络分为四个层次:郑氏与江南士人群体建立的社会网络,郑氏与元朝中央和地方官吏建立的社会网络,郑氏通过婚姻与血缘关系建立

的社会网络以及郑氏与地方乡民建立的社会网络。浦江郑氏社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郑氏得到地方主流社会的认可,更能够加强郑氏与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吏的联系,为郑氏谋取政治、经济等综合利益。另外,社会网络的建设还可以树立郑氏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提高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元朝是蒙古统治的政权,蒙古统治带来了传统伦理、价值观念普遍缺失的现象,这一现象在江南社会引起了普遍的担忧,浦江郑氏极力维护传统伦理的治家方式,受到江南士人为主的社会各界的赞美,元政权出于维护江南统治的需要,也主动迎合社会舆论,对郑氏进行旌表,这是郑氏在元代蒙古统治的情况下,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第九,张瑄是元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出身卑贱,南宋末年为海盗,归附元朝以后,帮助元朝开辟了海上运粮航线。由于漕运的成功,张瑄由海运千户,升任江西行省参政等职。其家族在经营海运和海上贸易中获得厚利,富比王侯。张瑄的发迹,引起了元朝一些官员的嫉恨,大德六年(1302)出现了朱清、张瑄之狱,张瑄父子被杀,家产抄没,部分家人流放到遥远的和林(今蒙古国北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厄尔德尼召北)。大德九年(1305),张瑄之孙张天麟赴阙上诉,得到成宗的同情,此后张瑄家族逐步得到平反,定居上海。武宗以后,张家弃武从文,逐步得到元朝的信任和士大夫的舆论支持,成为当地的“孝顺之门”,张瑄从孙张守中也通过当地乡试,成为乡贡进士。张瑄及其家族在元朝由武到文的发展轨迹,首先反映了元朝社会流动的特点,其次也反映了元代地方富豪之家,通过诗书守家,通过崇尚儒雅提高其在江南社会地位的发展规律。

第十,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有其固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民间义庄是主要内容之一。元代江南民间义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义庄的创立者主要为在职或离任的地方官员、学官以及地方好义之家。元代江南民间义庄发展比较困难,但民间义庄发展的条件仍然具备。江南民间义庄有严格的存储制度、用人制度和赈济制度,管理严格,经营方式灵活,成为元代江南地方社会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有趣的是,在元代民间义庄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江南士人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一些义庄的创办者本身就是士人,大部分义庄的运行过程中,士人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教化的制度来赞扬、鼓励,元代江南民间义庄的发展,对明清地方宗族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本研究主要通过元代江南士人与江南社会诸多方面的考察,探

讨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网络、政治追求、生存挣扎以及元代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发展演变的关系、江南儒士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等内容,揭示元代江南士人在元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地方儒士向地方乡绅的转变的社会发展趋势。

三、前人研究成果综述与本研究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士农工商分途的农业社会,作为“士”的主要代表,儒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从政治上来看,儒士群体既是各级国家官员的承担者,也是各级政府官员(包括吏员)的主要后备力量。儒士的这种亦官亦民的身份,使他们担当了国家和地方社会的沟通者或沟通媒介。国家法令、政令等通过士人传达到地方社会中的一般百姓,同时,地方社会的利益与儒士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也会通过士人议政、上书等形式,传达到国家各级政权,成为国家制定政策、法律的基本依据之一。儒士的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使他们的身份出现了两面性——既是国家统治意志的传达者,也是地方社会中地方利益的代言人。

另外,儒士群体还是传统文化(儒学)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儒士集团特殊的文化优势,使他们在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各级政权都会主动迎合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价值理念,地方社会也基本上会以儒学理念为准绳,这样,广义的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儒士群体则成为儒学的物化形式,也就是说,儒士群体是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国家和地方社会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主要参加者。

当然儒士还是国家教育体系的管理者和参与者,担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鲜血液的使命,这一点本人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①

总之,中国历代有关儒士的研究,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元代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有关元代士人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一个关注热点,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第1-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

第一,金元之际北方儒学、儒士研究。关于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儒士、儒学的研究较多,较早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台湾学者,如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一书,从“汉军制度与人物”、“儒士与儒臣”、“宗教礼俗”、“汉文化之侧影”等方面,考察金元之际的汉文化发展情况,在其“儒士与儒臣”篇,主要探讨了这一时期北方的士人的处境与社会活动。^①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从“儒学”、“汉军”和“儒生与其著作”三个方面,探讨了儒学、儒士和汉文化的发展情况。^②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一文,对1235年以前和1235—1276年两个发展阶段中,理学在北方传播的情况与特点进行了考察和论述。^③白钢《许衡与传统文化在元代的命运》一文,对许衡与理学在北方的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论述。^④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是全面考察金元之际儒士的地位与文化遗产的专著,该书“对这一时期士人的遭遇与活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使我们可以深切地了解“中原文明延续和恢复的艰难历程”。^⑤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兼论蒙汉精英涵化的滥觞与儒道势力的消长》一文,通过对大蒙古国时期国子学的建立及运行情况的考察,探讨了这一时期蒙汉“精英”之间的“涵化”关系以及儒道势力之间的消长。^⑥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以蒙古人统治汉地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戊戌选士”、“东平、真定等地学风”、“太极书院的创建及其遗风”、“文章派的华士和德行派的正士”等方面的内容,探讨了元初士人的生活和文化活动,对元初北方士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⑦另外,金元之际一些有关汉法或儒治的文章,也与士人的研究相关,如王明荪《十三世纪蒙元帝国与汉文化》、^⑧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⑨赵华富《论忽必烈行汉法的原因》^⑩等。

第二,有关元代儒士的宏观研究,近年来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萧启

① 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台湾文星书店1958年。

② 孙克宽《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1958年。

③ 《元史论丛》第二辑,第217—224页,中华书局1983年4月。

④ 《元史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⑤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

⑥ 萧启庆《蒙元史新研》,第65—94页,台湾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

⑦ 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册,第636—679页,中华书局1993年。

⑧ 《元史论丛》第八辑,第123—13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

⑨ 《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⑩ 《史学月刊》1985年第4期。